

中国青年报聚焦群体性事件过去三年后瓮安交出的答卷——

从大乱到大治 从对立到和谐 回归党的宗旨是钥匙

3年前,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“群体性事件”。只有近10万人口的瓮安县城,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。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,再加上谣言煽动,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、县政府和县委,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。

在一段时间里,“瓮安执政”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,“瓮安之问”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。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。3年过去,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?



2008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



昨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《瓮安答卷》

视点

瓮安实践说明了什么

通过过去3年多的治理,瓮安的成绩单十分靓丽:全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.3%,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7%。2011年,瓮安实现县内生产总值52亿元,财政总收入7.5亿元,分别是2007年的2.37倍和3.13倍。

2011年群众对干部满意度比2007年增长57.2个百分点,群众安全感指数比2007年增长38.65个百分点,排名全省第2位,尤其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从2007年的全省垫底提升到全省第1位。

瓮安的未来也十分光明。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60平方公里规模的城市雏形正在显现……

“从大乱到大治,瓮安所做一切的根本就是回归党的宗旨。瓮安的实践也证明,执政者只要醒着,就有的是办法去解决问题,攻克难关。”王长江分析说,“但是,怎样才能保证执政党永远警醒,不再睡去?”

目前,瓮安已普遍推行了村务民主决策的“一事一议”制度、科级干部由群众考评组“下评上”考核制度、各级政府部门公开承诺制度等等。让干部们印象深刻的,还有2010年的村(居)民委员会换届“海选”。在这次选举中,36.4%的原村(居)主任没有连任,而新当选的副主任则占到83.6%。这让村干部们第一次切实感到了压力。

“民主是一个多环节有机联系的系统。在中国现实情况下,选举环节的单项突进,并不一定会有期待的结果。”王长江说,“这不能成为不搞民主选举的理由,总得开始,发展民主的问题要靠民主的发展来解决。”

王长江表示,“只要执政者的动力和压力都是自下而上的,都来自于内部,来自于老百姓,瓮安就一定能够长治久安。”

声音



王长江 资料图片

“参加群体性事件的许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,大多是因为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。对于人民内部矛盾,解决的关键是切割好利益。执政党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,这是瓮安人用血换来的教训。”

——中央党校教授 王长江

本版内容据中国青年报

信访奇迹 80%纠纷 可止于初访

2008年7月4日,“6·28”事件刚过去6天。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,连换洗衣服都没带,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。此前,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。

龙长春劈出了第一板斧——县委书记大接访。“要化解民怨,就必须直面矛盾。”除了书记大接访,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、教师大家访、公检法司大联访、乡镇干部大走访,俗称“五大访”。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。

构皮滩水电站移民搬迁是瓮安的一个著名积案。由于不满安置政策,部分移民长期上访。2004年12月,当时的县领导带队到江界河村商议补偿标准,谈判陷入僵局。有村民将宪法拿给县领导,让其当众朗读第二章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,干部群众发生激烈争执。不满的移民把工作组扣了两天,工作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脱身,解救中多名村民受伤。从此,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块板结的伤疤。这块伤疤不时化脓。一些移民参与了“6·28”事件,还有的移民抢占乡政府食堂,自己淘米做饭。2009年夏,瓮安县工作组到江界河村进行了逐户访问,他们发现,僵局缘于敌对思维,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,再死的结也解得开。新政策很快出台:愿意搬迁的移民,及时补偿到位。暂时不愿搬的不强迁,哪天愿意哪天迁,县机关部门对口帮办手续。实在难离故土的,政府花钱在水线上平整一块地,供其建房安置,并由县领导逐一“包保”。“移民后来大多自愿迁走了,300多户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户。”龙塘乡党委书记李飞对记者说,“留下的也已安定,江界河基本实现了息访。”大接访次年,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,2010年下降到693起,较2008年下降68%。“80%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。”一份总结报告写道,“如果基层执政得力,民怨何以如此淤积,又怎么会爆发‘6·28’事件?”

权力失范 干群关系 扭曲错位

“6·28”事件其实早有前兆。“2008年的时候,冲突已有好多次。农民扣干部,警察抓农民,有一次水库移民甚至冲击了公安局。”一位瓮安老干部对记者说,“点燃县委大楼的那把火,是迟早的事。”

“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。”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。

“玉山帮”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。“玉山帮”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。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,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。其间,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,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,其能量让外人目瞪口呆。

在“玉山帮”的审判卷宗中,记者看到了6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字,其中有乡镇党委书记、科局级干部和公安干警等。判决书写道:由于他们的庇护纵容,“玉山帮”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力量,从而发展壮大。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曝光的保护伞之一。乡邻周知的是,他的儿子拜了“玉山帮”老大熊教勋做干爹。2005年,“老亲”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,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。多次滋扰威逼无效,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“劝退”,并允诺赠送未来“腾飞”洗矿厂干股。此事正合杨兆明之意。他随即伙同副书记郎永林以无证开采为由,威逼原老板退出了矿山。事后杨、郎如愿各分得“腾飞”六分之一股份,先后获利人民币20多万元。在“腾飞”,杨、郎也默认提供“官方保护”。中坪镇派出所原所长杨育平和“玉山帮”另一老大卢宝霖是干亲,杨在卢的多个赌场都有干股,杨调到哪里,卢的赌场就开到哪里。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杨育平多次上演无间道。2007年1月,杨得知县公安局决意要禁赌,就给“玉山帮”传过话去:“我们搞的赌场应该停了,不如我带派出所把它砸了,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。”3天后,杨带着五六个警员冲到赌场,当场砸了啤酒机,还煞有介事地罚了“玉山帮”3000元。

重归公仆 组织压力 逼出奇效

压力让瓮安人警醒。醒来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们“赶”到百姓中去接地气,建感情,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。这是强制性的,自干部作风教育整顿以来已问责127名干部。

杨胜乾是雍阳镇原政法委书记,因“6·28”事件受到处分,被调往鱼河乡任乡长助理。深溪村是乡里情况最复杂的村,杨胜乾选择到那里“从头再来”。

进村第一次开大会,“那天出大太阳,主席台在屋檐下的阴凉处,村民们都坐在坝子中间。”杨胜乾说,自己刚在台上坐下,就听到有人喊,“为哪样你坐在阴凉里,我们晒太阳?”“对哈,大家都坐在一起。”杨胜乾应和着赶紧把桌子搬到坝子中间。那次大会后,杨胜乾成为深溪村党总支书记。

接着,杨胜乾为村里引资准备发展1000亩精品猕猴桃种植基地。但一下子流转出这么多土地,在过去肯定要吵得天翻地覆。杨胜乾给农户一笔笔算经济账,靠着增加收入美好前景说服了大家。“现在懂得了什么是为老百姓执政。”杨胜乾总结,把自己摆在服务者的角度,用一颗公心干工作,才会赢得公信。

“瓮安现象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管束特点。”王长江教授说,“而这里的作风转变之所以效果好,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风暴,还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。”

瓮安县委组织部率先试水建立了“基层组织局”。他们首创了机关和基层党支部“双向组织生活”。“现在县乡村干部都实行了‘写民情日记’、‘记民情台账’制度,以检查干部下基层的情况和对农户的了解。”瓮安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彭志伟说,“这些记录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。”最有特色的是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的制度。目前已有49个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,约占全县村支书总数的一半。

立党为公 利益切割标示 执政理念

瓮安矿产丰富,自古就流传着“谁能识得破,金银用马驮”的诗句。如何切割好这块“肥肉”,一直考验着瓮安的基层政府。

瓮安的磷矿大多在玉华乡,这里也是矿群矛盾最尖锐的地方。由于矿产的开采,当地地下水源曾被挖断,人畜饮水发生困难,而地基的下沉,也导致一些百姓的房屋开裂。

“政府的税收增加了,老板腰包鼓了,村民非但没有受益,甚至还受了损失。”玉华乡乡长张林才说,“这样的发展怎能不累积危机?”

2008年10月,瓮安县人大通过了《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》,制定了“谁开发、谁保护,谁引发、谁治理,谁破坏、谁恢复,谁受益、谁补偿”的原则,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,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。

在新理念指导下,玉华乡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。牛官村由于矿产开发,许多农民失去土地,生活无着。运输矿石是很大一块肥肉,可乡里的车队长期交给私人老板经营,村民得不到一点利益。为此,失地农民常常堵路。

“6·28”后,玉华乡动员老板退出车队,然后成立了“北斗装运有限责任公司”,村民一人一股,每股2500元,总集资120万元。公司雇用经理班子负责运营,除提取一定公益金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,红利年终均分给每个村民股东。2011年,每个股民都分到了2000多元。

“公司制度非常严密。每年出生的婴儿在次年入股。”总经理舒迦华说,“公司成立后,再没发生过堵路,一堵路,就损害自己的利益啊。”